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刘正刚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上

海洋
中国与
世界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上)

刘正刚\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中 国
与 界
世 丛
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刘正刚著.
-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4. 12 (2007. 4 重印)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杨国桢主编)
ISBN 978 - 7 - 81075 - 605 - 1

I. 东... II. 刘... III. ①人口迁移 - 历史 - 研究 - 福建省 - 清代②人口迁移 - 历史 - 研究 - 广东省 - 清代
IV. ①K295.7②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1957 号

**海洋
中国
与
世界**

书 名 东渡西进: 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
编 著 刘正刚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电 话 (0791) 8529392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7.25
字 数 246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89.40 元 (上中下)
书 号 ISBN 978 - 7 - 81075 - 605 - 1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20 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21 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



化的研究，是 21 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 3~4 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1996 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 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

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2010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12册），便是《海洋与中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211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的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



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

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作了大量的加工，或作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



考古的新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楊國植

2003 年元旦

致读者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一直在陆海兼具的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在不断开拓内陆的同时，始终不屈不挠地开发海洋国土资源。中国移民即向内陆移民也向海洋移民。就海洋移民而言，可分为国内移民与国际移民两大类型，这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闽粤两省尤为突出。闽粤地区的居民至少自宋代已开始向海洋进军，《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府”所载宋人谢履的《泉南歌》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异域。”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压力不断增大，海洋已成为闽粤民众谋生的重要途径，清初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三“论南洋事宜书”云：“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清代闽粤地区民众在漂洋过海锐意开发中国沿海岛屿的同时，也浩浩荡荡开赴内陆各地谋求生存与发展。清代台湾移民属于海洋性移



民，四川移民则为内陆性移民，两者均属于国内移民。清代移民台湾与四川均得到官府支持，印证了中华民族在国土资源开发上的陆海并重。本书就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当今西部大开发和东出海洋战略的实施，不仅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颇具现实意义。

清代移民台湾与四川是中国移民史这一历史长卷中最为波澜壮阔的巨幅画像，直到今天，仍然吸引着学界和民众的一束束目光，激发着人们浓厚的兴趣。台湾人的根在祖国大陆，特别是在闽粤两省，这已成为世人皆知的常识，四川（包括今重庆市）的普通民众至今仍能对“湖广填四川”的历史侃侃而谈，此乃清代两地大移民留下的深刻历史记忆！当今台湾与四川的开发和发展是历史的延续。明末清初，台湾是待开发的处女地，四川则是一片战乱废墟。然而，至迟到康熙末年，两地的社会经济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雍正以后，两地更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米粮和蔗糖出口基地，这一显著成就的取得正是清代移民不断涌入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清代持续不断的移民浪潮，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丰硕

的成果。

台湾与四川均是清代典型的移民社会，但两地移民社会的变迁存在明显差异。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明清之际，历经战乱洗劫的四川，人烟稀少，社会处于瘫痪状态。台湾自宋元以来已有大陆移民零星进入，但直到清初仍是一片荒原。因此，清初至乾隆年间，移居两地的移民人数均达到百万以上。但因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四川移民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迁徙到定居乃至对迁入地的情感认同。相对而言，台湾移民所经历的这一过程较长，直到1860年前后才大致完成。台湾与四川地理位置明显不同，台湾地处祖国东南边陲的海疆，属于海洋性社会，四川则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属于内陆性社会，对两地移民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海洋性移民和内陆性移民的比较研究。

汉人开发台湾最早始于宋元时期的澎湖岛。从明代开始，福建沿海地区的汉人才开始有意识地向台湾岛移民开垦，经过荷据、明郑时代的不断招民入台，台湾的汉人明显增多。清初为了阻止明郑反清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实行迁海、禁海政策，以政权控制的手段阻止移民入台。康熙统一台湾后，



大陆人口移民台湾进入高潮，有清一代连绵不绝。四川的汉人移民开发脚步至迟开始于战国的秦灭蜀，中原移民的进入加速了巴蜀地区内地化进程。自此以后，中原移民入川几乎未曾中断过。^①但清代移民四川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清代移民入川自顺治年间已零星开始，后因“三藩之乱”暂时中断，“三藩之乱”平定后，引发了长达近百年的移民入川浪潮。大规模移民入川在乾嘉年间已基本结束。

清代移民大规模进入台湾与四川大约均始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属于和平盛世的人口自由流动，移民基本上是为谋生求发展的经济性移民。清前期是移民进入两地的高潮期。尽管两地移民结束时间先后不一，但两地移民社会明显存在可比性。清初台湾与四川移民环境同中有异，台湾移民来源地主要以隔海相望的闽粤两省为主，四川移民来源地则相当广泛，几乎涉及了当时所有的省区，但闽粤移民所占比重较为可观。而台湾与四川的闽粤移民地域构成又有区别，台湾移民主要是闽粤沿海人民，包括小部分内陆山区人民；四川移民

^① 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2页。

主要是闽粤内陆山区人民，包括小部分沿海人民。那么，闽粤移民在清前期为何要舍近求远入川而不是全部入台，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相同地理环境下的闽粤移民在同一历史时期分别移入环境迥异的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移民发展的模式是否一致，也是值得深究的。移民与祖籍地的关系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话题。由于台湾移民在早期大多属于“候鸟式”迁移，即使后来的单身男性移民，其眷属也大多留在祖籍地，台湾移民与祖籍地的关系相当密切，移民对祖籍地的情感认同十分强烈。四川移民虽然与祖籍地关系未断，但至少在形式上没有台湾移民对祖籍地那么强烈，大多数移民在挺进四川的过程中，就已经做好扎根四川的心理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移民在台湾与四川均建立了自己的血缘和地缘组织。一般而言，地缘组织对移民的控制和约束在早期颇为有效，而当移民家族人口不断增加，血缘组织也随之建立，并与地缘组织共同控制和约束移民，移民对迁入地的心理认同感也更为明晰，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

台湾的土著居民与大陆汉人交流相对较晚。早期开发主要是闽南人对今台南地区的开发。除此之



外，台湾都属于番地，即平埔族人和高山族人的生活范围。清代移民在对台湾的开发过程中，首先与平埔族人发生接触、矛盾甚至冲突，随着移民开发的不断深入，平埔族群或被汉化，或向山区迁徙，生活区域不断缩小，造成“番地尽为闽粤所有，计通台九十二社，田园皆失，存者不过万分之一。”^①四川的土著居民与汉人交流可上溯到战国，相互之间比较了解，清代移民入川首先占垦成都、重庆等较繁荣、富庶的中心区，乾嘉以后，移民及其后裔开始深入到川边的羌族、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由于这些土著居民与汉人交往历史悠久，他们主动将田地佃给汉人耕种，甚至掳掠汉人到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垦殖。经济开发是移民的最主要社会活动。在农业垦殖方面，台湾以垦户招佃制为主，反映新开发区筚路蓝缕的艰辛；四川则以自耕农为主，是对老农业区经济的恢复。台湾移民经济的商业气息比较浓厚，四川移民经济更多地保持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特色。在商业发展上，台湾全方位发展与大陆及海外的贸易往来，凸显了海洋性商业特

① [清] 陈盛韶：《同俗录》，卷六，“鹿港厅”，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

征，四川的商业发展主要依托省内各级市场，并积极拓展省外市场和周边的民族市场，难以摆脱传统内陆性贸易的框架。台湾与四川移民社会的人口构成相当复杂，尤其是随着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游民的数量也不断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也随之增加，台湾的罗汉脚和四川的咽噜都是由移民中的游民构成的。两地移民的民间文化活动形式上相近，但内容和功能不尽相同。

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清代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改变了地域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态，为落后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并最终使台湾与四川都发展为当时的经济发达地区。清前期，人口大规模、远距离的地域流动愈益频繁，尽管最终没有导致整个社会近代化，但中国传统社会却因此而稳中有变。不同地域间的人口流动，使区域的社会经济、生产技术、文化观念得以交流，移民在迁入地社会的拓垦竞争，使移民社会的发展充满活力，促使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移民都经历了从外来者向定居者转变的时空过程；这实际上是移民在迁入地自我认同的过程，所需时间的长短难以一概而论。从法律上讲，四川移民入川即可入籍，



子弟还可参加科举考试，其移民和定居过程基本上同时完成。移民对四川本地的情感认同大部分也在短期内完成，入川伊始，就迁祖先骸骨入川重葬和在四川建立祠堂，即生动地反映了移民对四川的认同心态。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东龙川移民在《往川人民告帖》中宣称：“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面对官府的阻拦，他们发出“我们家已在四川，还回到哪里去”的呼喊。^①与此相反，台湾早期移民往往自称是福建某县人或广东某县人，大约在嘉庆以后才产生了对台湾的认同心态，在时间上比四川移民晚了很多。^②无论是台湾还是四川移民社会，以祖籍地缘关系为主进行组合是其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移民与土著居民、他籍移民以及祖籍地等发生多重关系，隔阂和矛盾冲突在所难免，但基本趋势是逐步由对立、冲突走向融合，由移民社会走向定居社会。即使定居社会转型完成之后，移民社会的某些特征仍长久发生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在四川与台湾社会还可以感受

① 故宫博物院：《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22辑，“杨永斌折”，（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1979年版，第101~102页。

② 周翔鹤：《从清代台湾公共墓地——义冢看移民的认同心态》，《台湾研究集刊》，1994（2）。